



何問西東

——題贈《國際漢學》

張國剛

張騫九死通西域，
利瑪東遊不老情。
諾亞原來華夏客，
伏羲竟是甸中星。
胡僧義譯儒家說，
學士深研曆算經。
郢燕傳書增氣象，
丘園互鑑共文明。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物造像，縱目、寬鼻，形態肅穆。這種藝術風格與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青銅雕像相近，有可能是吸收了西亞文明的因素後改造創新而成



商／青銅人首／國家博物館藏



「飛天」出自佛教天神「天龍八部」之一，原本名叫「天人」，是音樂之神乾闥婆和緊那羅的合體。經由絲綢之路傳入後，與道教的「飛仙」藝術結合，並逐漸受到中原「秀骨清像」的畫風影響，身材變得修長，眉細疏朗，飄帶飛揚，呈現出靈動飛升的仙境意象。



初唐 / 敦煌莫高窟第 329 窟 / 蓮花飛天藻井



唐／鴛鴦蓮瓣紋金碗／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鴛鴦蓮瓣紋金碗／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時期絲綢之路暢通，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空前繁榮，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領域。以唐鴛鴦蓮瓣紋金碗為例，它使用了西方金銀器製造的捶揲工藝，並被用作酒具。這一點應該是模仿了西方貴族的生活方式，因為在唐以前的中國，金銀器主要用作裝飾品。



唐／鎏金雙獅紋銀碗／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鎏金雙獅紋銀碗也是中西方藝術風格交融的代表之作。碗底的雙獅、繩索紋與波浪紋借鑑了薩珊銀器徽章式紋樣的工藝，這種工藝在西亞、地中海沿岸與歐洲王室流傳久遠。雙獅中間的如意雲頭紋則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紋樣。

粟特人是絲綢之路繁盛時期最活躍的中轉貿易商，他們從中原採購絲綢、六畜運往西方，再把西方的物質精神文化傳入中國，粟特人不僅成為絲綢之路上傳奇的商業民族，也深度參與了中原王朝的政治事變，廣為人知的就是「安史之亂」。



唐／三彩騎駝奏樂俑／西安博物館藏





清／廣彩人物圖盤／廣東省博物館藏

至清中期，廣州十三行外貿繁榮，取代了澳門離岸貿易貨棧的地位，成為壟斷性對外口岸。在當時的外銷品中，廣彩瓷器頗受歐洲王室貴族的熱捧。圖中是東印度公司來樣加工定製的西洋人物圖盤，有人說圖案繪製的是廣彩瓷的「鐵粉」路易十五和他的情人蓬帕杜夫人



18世紀／《皇清職貢圖》／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與西方的遙遠距離和文化上截然不同的陌生感，使西方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中國充滿了虛幻的想像。耶穌會士入華，拉開了西方認識真實的東方世界的帷幕，他們將想像從天上拉回人間、從抽象轉向具體、從大美器物上升到政治制度



18世紀的歐亞大陸，其一端在追崇中國趣味，另一端在流行西洋風尚。「中國趣味」在當時的歐洲達到巔峰。《世界報》稱，中國壁紙在豪宅中極為流行，中國絲綢在英國蔚為風尚，英華園林風靡一時，……處處烙刻的中國圖案，洋溢着歐洲人對異國情調和理想生活的嚮往



清／矩度全圖儀／故宮博物院藏



晚明盛清，紫禁城的西洋風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式精巧的科學儀器。啟蒙時代雖然帶來了中歐文明互鑑之光，但是由於文化、制度的不同，這束光芒很快就消散了

目錄

序言

傳統絲綢之路上的動力機制 i

第一篇

鑿空之舉 從文明的邊疆到西眺羅馬 1

第一章 人類的童年與文明的邊疆 3

第二章 遠古神話中的東方與西方 13

第三章 希臘化時期：絲路之前的中西文明交流 27

第四章 鑿空之舉：張騫出使西域 43

第五章 東漢與羅馬：絲路帝國的遙望 54

第二篇

諸神入華 東來傳經與西行求法 67

第一章 從西域神僧到中土大唐：佛教入華 69

第二章 從敦煌飛天到楊貴妃的胡旋舞 83

第三章 景教入華：唐代的基督教與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98

第四章 中古絲路上的粟特商人 116

第五章 中古絲路上的「西遊記」 128

第三篇

季風南海 陸上絲路的衰落與海上絲路的興起 145

- 第一章 天方海舶：宋元南海「香瓷之路」 147
- 第二章 《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162
- 第三章 三保太監鄭和與航海王子亨利 173
- 第四章 晚明盛清的中歐貿易格局（上）：
雙嶼港與海上走私 184
- 第五章 晚明盛清的中歐貿易格局（下）：
澳門與廣州的離岸貿易 190

第四篇

想像異邦 中歐文明的交流與互鑑 205

- 第一章 「利瑪竇規矩」及其意義 207
- 第二章 明清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政治 218
- 第三章 歐羅巴的「中國趣味」與紫禁城的「西洋風」 229
- 第四章 禮儀之爭：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239
- 第五章 18 世紀晚期中國形象的逆轉 250

終篇

歷史視野與現實觀照 271

序言

傳統絲綢之路上的動力機制

人類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肇始於莽原時代，礙於自然條件，其規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進入文明社會，特別是在國家誕生以後，文明的交流和互動便更多受到社會中多重因素的影響。近代以前，規模尤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亞歐大陸（包括非洲東部地區）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這個歷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東向西、自西徂東，是雙向互動的。

距今約一萬年前，中國最早栽培了小米（粟），最早培育了水稻，是稻米的發源地，中國將這兩種農作物傳播到世界。其後，大約 4 000 年前，西方培植的小麥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傳到了中國。印歐人遷徙用的輪式馬車，很可能也影響了殷商的馬車式樣。中國早期的青銅技術比較粗劣，受到歐亞草原東部青銅文化的影響而取得進步。不同於西方的青銅器往往作為工具來使用，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更多是作為祭祀等重大典禮活動中的禮器。先秦時期，甘肅地區發現的青銅器不僅明顯受到西來文化的影響，也是冶金技術本土化的範例。到了秦漢時期，中國的冶煉鋼鐵技術已經獨樹一幟，以至於博物學家老普林尼都稱讚，「賽里斯的鋼鐵雄冠其時」。

從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論，戰爭的動力作用不可無視。戰爭是野蠻的，卻也是開拓東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動力。印歐人的民族大遷徙，既是人類群體的自由流動，也伴隨着戰火紛飛；它促進了東西方文明、農

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大交流，也帶來了血與火的殺戮和掠奪。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推動了希臘化文明向東方拓展。所謂希臘化文明，就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與亞洲各地區文化在馬其頓軍團的鐵蹄下融合的產物。波斯帝國時期，絲綢之路的驛站和道路已經修建完畢，到漢武帝開通西域，正好實現了對接。

人類對財富與成功的渴望，以及對創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終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動力。野蠻時代訴諸戰爭，隨着文明時代的推進，這種動力機制變得多元而且複雜，戰爭本身也不完全出於經濟或財富目的。

首先是出於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外交）的需要，這是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一個維度。無論是西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前 138 年），還是東漢和帝時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都肩負着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無論是唐德宗貞元元年（785 年）楊良瑤海路西行，還是始於明成祖朱棣時期的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 年），都是出於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秦漢以來，北部疆域的最大威脅來自匈奴。秦修長城，漢公主和親，都是從防守層面保衛邊疆。到漢武帝時期，經過漢初六十年的休養生息，漢朝國力足以主動出擊，保護邊民與疆土的安全，因此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西域，尋求與同樣曾遭受匈奴侵犯的大月氏人結盟，共同抗擊匈奴，這才有了「鑿空」的壯舉。安史之亂後的唐朝，西北邊地兵力後撤，給吐蕃進犯的機會，唐代宗時期甚至打到了長安。繼位的唐德宗命楊良瑤出使大食（阿拉伯帝國），就是希望對吐蕃形成牽制，緩解唐朝西部邊境的軍事壓力。

絲綢之路的經略歷來是中原王朝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張

溝通西域打開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後，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關係的穩定與互信，為絲綢之路暢達提供了保障，也是和睦西部與邊疆地區胡漢關係、維護邊境地區軍事安全的必要條件。

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鞏固了漢朝往西部投送力量的能力。漢宣帝時期設置了西域都護府（治所在今新疆輪台，西域都護秩比二千石，相當於副郡級單位），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其後，呼韓邪單于前來歸附並和親，「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漢代採取移民實邊之策，蠶桑業在河西走廊發展起來，居延漢簡裡多次出現「桑」「帛」等字，漢酒泉郡祿福縣出產的絲綢被稱為「祿帛」。唐朝安史之亂之後，戰亂使河西走廊地區的蠶桑業迅速走向衰頹，經濟環境的惡化也是導致陸上絲綢之路逐漸衰落的重要原因。

隋唐時期對於西域的經營更是不遺餘力。貞觀四年（630 年），西北各族君長尊唐太宗為「天可汗」，並修築「參天可汗道」，既是尊重唐朝的宗主國地位，也是為了加強和便利與唐朝的交通往來。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唐太宗進一步在周邊和域外地區推行羈縻府州新體制。與羈縻府州相輔而行的是冊封制度。羈縻府州的首領在被封為刺史、都督的同時還對內稱王，這個王在名義上是被唐朝冊封的。這種冊封是一種政治主導地位的宣示。藉助軍事、經濟和文化更先進的唐朝的權威，域外政權對內可加強和鞏固自己在當地的統治，對外則可防範強鄰的侵犯，同時也可以從朝貢貿易中獲得經濟利益。

不過，安全與互信也取決於朝廷對國家安全狀況的評估，這以明代嘉靖時期最為典型。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 45 年，崇道煉丹，在北方拒絕邊境互市，在南方嚴格施行海禁，原因是他對於邊境安全狀況存在嚴重的誤判。高拱、張居正執政時期，在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將的守護下，北方有「隆慶和議」，俺答汗以順義王的名義歸附，南

方有漳州月港重新開海，海盜轉變為海商。事實證明，在國家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絲綢之路才會物暢其流，實現發展與繁榮。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二個維度是經濟與財政需求。從根本上說，中國巨大的經濟實力是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重要前提。就總體情況而言，從人口和經濟規模來說，漢唐時期中國西部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有限。漢唐時期所謂的「和親」，是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之間政治和解的代名詞；五代至宋代不再有「和親」，因為中原王朝處於弱勢地位，時或納貢稱臣。無論是「和親」，還是納貢稱臣，雙方博弈的目的都是尋求中原方面開放邊境互市。在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政治關係中，若中原王朝處於強勢地位，通常將雙方的經貿關係稱為「朝貢」，否則就稱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亂之後與回紇的互市貿易，對於回紇來說是獲得經濟利益，對於唐朝來說則是維繫政治關係。邊境互市和開放海禁對於沿海地區的百姓生計影響巨大，但是對於整個中原王朝的經濟影響則相對較小。

與朝貢貿易不同，宋元以後的市舶貿易展現出比較純粹的經濟訴求。唐朝在廣州設有市舶使，宋代以後成為市舶司。市舶貿易是宋元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間存在的貿易關係，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貿易通過對商品的「抽解」和「博買」，為政府帶來了十分可觀的經濟收入。我們很難對海上貿易進出口總額進行精確統計，但可以作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時，廣泉兩州加兩浙路每年貿易總額應在千萬貫以上。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歲賦總入應在一億貫左右，進出口總額約佔 1/5，超過兩千萬貫。據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所載，南宋政府每年總收入不過四千萬貫，市舶收入竟佔 1/20。^①

① 黃純豔，《宋代海外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75頁。

宋朝出於財政經濟目的，鼓勵民間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貿易。民間商人從事貿易受到的限制條件相對寬鬆，貿易成績顯著者還能得到獎勵，甚至被授予相應官職。這些鼓勵政策使中國沿海民間商人紛紛投向海上貿易，使唐中葉以前中外海上貿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徹底發生改變，也使政府使節附帶進行的貿易行為顯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縮和對朝貢貿易的限制，也導致把貿易領域更多地留給民間海商。正是這些為利益奔波的廣大民間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貿易的高潮，泉州地區至宋朝方才形成顯著的出海貿易風習。除了五代時期閩國政府的鼓勵之外，有學者認為，10至12世紀泉州地區的大批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對該地區海貿習俗的形成有重大影響，且一旦成為習俗，就代代傳揚，終成該地區的基本特色。^①

總之，巨大的經濟能量是中國在中西交往中的優勢。絲綢、瓷器、茶葉是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絲綢和瓷器是典型的製造業產品。雖然茶葉的原料出自農業，但是其製成品也屬於加工製造業。漢唐時期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質量上乘的絲綢，宋元以後則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時期又加入了茶葉。傳統的熱銷產品不斷拓展新市場，而不同時期又都有新的熱銷產品加入絲路貿易中來。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三個維度是科技對於絲路交往的重大促進作用。以海上絲綢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學知識以及航海動力技術、造船技術、導航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進行遠洋航行。對信風週期規律的發現與運用，對亞洲季風環流規律的發現與應用，都是開闢海上絲路極為重要的因素。5世紀初，法顯就是乘坐海船從斯里蘭

^① 張彬村，《宋代閩南海貿習俗的形成》，刊《海交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0頁。

卡回到廣州的。中國的指南針以及領先的造船技術，也支撐了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到了 15 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以及 15 世紀末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人們對於海洋的認識以及海圖繪製技術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這些知識的進步也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四個維度是宗教熱情和知識追求。穆罕默德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可見知識對人的吸引力。漢唐時代，無數僧侶排除艱難險阻，東來弘法，西行求經，不絕於途。

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早在漢代以前就已經傳入西域，新疆地區的考古依據充分證實了這一點。正史記載，兩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准許的方式在中國傳播開來。但是，佛教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早先是胡僧入華傳教，支婁迦讖、竺法護、佛圖澄、鳩摩羅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後來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經典被翻譯成漢文，使得漢傳佛教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佛教寶藏。佛教音樂、雕塑、繪畫大大豐富了中古世俗文化與藝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隋唐時期入華，也成為中古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獨特景觀。

對於域外世界的好奇同樣牽引着仁人志士奔競於途。張騫通西域之後，帶回了關於西域和南亞地區的新知識，引發之後朝廷多次遣使，漢武帝甚至號召民間使團以官方的名義出使西域。鄭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雖然迄今仍眾說紛紜，但是政治、外交目的必定是首要的，而獲取海外資訊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費信的《星槎勝覽》、馬歡的《瀛涯勝覽》等實地考察記錄帶來了大量海外信息，也豐富了時人對世界的認知。與此同時，鄭和下西洋帶回的物料和工藝、技術方面的交流，促進了國內手工業生產水平的進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質入華，使明代工

匠積累了製作硬木傢具的經驗，對於明代傢具工藝的進步有重要影響。進口陶瓷原料蘇麻離青（或稱蘇勃泥青），深刻影響了永樂、宣德時期青花瓷的樣式和風格；也有觀點認為景泰藍的工藝發展也受到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對這些工業原料的追求刺激了中西之間的貿易往來。

毫無疑問，有關絲綢之路上的各種活動，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出發點、民間貿易的積極性是有很大差別的。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是開展邊境互市貿易、官方朝貢貿易（勘合貿易）的首要訴求。民間商業活動則以利益獲取為主旨。也有許多仁人志士懷抱宗教熱忱或者追求知識的理想，奔競於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上。不同的利益訴求共同促進了絲路的繁榮與發展，而科技的進步則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前 323—前 146 年

希臘化時期：中西文化的接榫

前第 2 千紀

印歐民族大遷徙，最早的東西方文明互動發軔於此



第一篇 鑿空之舉

從文明的邊疆到西眺羅馬

1 至 2 世紀

絲路兩端的東漢與羅馬帝國

前 139 年

張騫出使西域



第一章

人類的童年與文明的邊疆

遠古時期，人類走出非洲，播遷於世界各地，最終形成了以五大文明為代表的人類古文明。童年時代的人類文明無一例外都是農業文明，誕生在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

在歐亞大陸，這些古文明猶如星星點點的綠洲，總是遭受周邊游牧部族的威脅。或者因為氣候的變化給山地和草原牧民帶來災難，或者出於對文明國家財富的垂涎，在綿亙東西的北方草原上，從公元前第 2 千紀開始，發生了一場持續千年的民族大遷徙，遷徙者絡繹不絕。然而東西流動只是通道，南下侵入文明城邦或國家才是目的。世界五大古老文明在印歐民族大遷徙的衝擊下，或涅槃重生（如印度與中東文明），或孤苦伶仃以待新生（如地中海的希臘文明），或交融互補進而發揚光大（如商周時期的中華文明）。

一、人類的誕生與文明的起源

人類的歷史已經進入公元後第三個千年的第三個十年。

追根溯源，人類的先祖大約在 250 萬年前出現在我們這個地球上；而這一劃時代的事件，本身又是億萬年中大自然萬物進化的結果。

早期的人類先祖雖然能夠直立行走，但是腦容量比較小，肢體還帶有猿的特徵，所以被稱為猿人。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大約在 50 萬

年前或更早的時候，人類的先祖逐漸發明和掌握了三大生存技能，即石器打擊技術、人工取火技術、分節語言能力。雖然生活資源依然來自採集和狩獵，但是隨着工具的進一步改進，他們開始將火用於取暖、照明、燒煮食物。

到了距今 25 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進化到了智人階段。智人階段的人類有更強的遷徙能力，當他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走出非洲，於 5 萬至 6 萬年前到達大洋洲，於 3 萬年前到達亞洲，於 1 萬多年前到達美洲時，已經屬於現代人類了。為了適應各地不同的地理環境，人類逐漸分化為不同膚色和體型的群體。現代人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強，他們躲過了第四紀冰川的劫難，在距今 15 000 年左右進入新石器時代。這個時候，威脅人類生命的兇猛動物大大減少，人們的經濟活動也有了新的變化。尤其是 12 000 年至 10 000 年前全新世到來後，地球的氣候逐漸轉暖，更加適合農作物的生長，於是，採集逐漸發展成農耕，狩獵也演進為畜牧業，這些變化被稱為農業革命。距今 6 000 年左右，地球進入全新世大暖期的盛期，氣候和環境更加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文明之花首先在適合農耕的兩河流域、埃及尼羅河流域、南亞印度河—恆河流域以及東亞黃河流域綻放。人類文明進入了茁壯成長的「童年時代」。

農業革命是人類古文明誕生的前提。例如：西亞是小麥、大麥的故鄉，其種植大約發生在 9 000 年前；東亞有粟、黍、水稻、蠶桑，中國北方黃河流域的粟、南方長江流域的水稻栽培，距今都有近萬年的歷史；美洲在公元前 7000 年就培育了土豆、玉米、紅薯等。總體來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溫暖濕潤、適合農耕的河流附近誕生的，其形成時間距今 8 000 年到 5 000 年。

蘇美爾文明最早在兩河流域誕生，古巴比倫文明也是兩河流域文

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楔形文字、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統、《漢謨拉比法典》等是其熠熠生輝的表徵。關於兩河流域的文明史，從形式上看，表現為來自北方的印歐人和來自南方的閃米特人爭相搶奪這塊肥沃的農業資源。

與蘇美爾文明同期或稍後，尼羅河流域誕生了古埃及文明，金字塔、象形文字、成熟的王朝管理系統是其璀璨的成果。在古巴比倫和古埃及文明世界的邊緣地帶坐落着兩個國家：南亞的印度和南歐的希臘。印度河流域的本土文明哈拉巴文化（早於公元前 2000 年）、希臘愛琴海周邊的米諾斯文明（約前 2850—前 1450 年），在與中東上古文化的交流互鑑中，產生了變異與創新，逐漸成長為新穎別緻的新文明形態。

在遙遠的中國，則誕生了偉大的華夏文明。2019 年，良渚文化（距今約 4 300—5 30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歷史，這已成為國際公認的事實。距今約 4 300 年的石峴文化時期，大約就是《史記》中記載的「五帝」時代。司馬遷筆下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構建起華夏文化的血緣譜系，夏商周三代乃至春秋戰國的各個諸侯國都自稱黃帝的後裔。此外，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長江流域的凌家灘文化等，也體現出中華各地域文化的原創性特徵。現代考古學家用「滿天星斗」和「多元一體」來形容新石器時代晚期中華文明的宏大格局。

二、古印歐人的遷徙與文明的匯流

世界五大古文明在歷史長河中命運多舛，重要原因就在於，這些文明的周邊始終環繞着對農耕民族虎視眈眈的眾多游牧民族。

公元前第 2 千紀，歐亞大陸的東西方古文明，在游牧民族遷徙的推

動下出現過一次大規模的交流。從東部蒙古高原逾阿爾泰山脈、準噶爾盆地進入中亞北部哈薩克草原，再經裡海北岸與黑海北岸到達多瑙河流域，這條由草原鋪就的綠色通道就是當時歐亞文明交流的大舞台。游牧民族大遷徙帶來了衝擊，也帶來了新的變化，各個文明互相汲取、互相融合，在戰爭與和平交替中成長。

在這個舞台上活躍着的游牧民族，從語言上劃分，有漢藏語系的羌人（即後來的吐蕃人），有阿爾泰語系的蒙古人，還有印歐語系的印歐人。釐清不同語言的游牧民族的族屬，辨別其留下的歷史痕跡，是不同時代的學者致力研究的課題。然而直到今天，人們從語言學、考古學、遺傳分子生物學、歷史文獻學角度進行的多方面探討，也尚未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

以印歐人為例。印歐語系十分龐大，大體被分為印度—伊朗語支、日耳曼語支、羅曼語支、斯拉夫語支等等，其中印度—伊朗語支又可以分為印度—雅利安語支和東伊朗語支。希羅多德筆下的塞人（印歐人的一支）講東伊朗語。吐火羅語也屬於印歐語系，但與塞人的東伊朗語支不同。

最早的印歐人是誰？他們從哪裡來？目前學術界有兩種主流觀點：一種認為他們來自高加索地區，另一種則認為來自近東地區。也有人認為這兩種觀點或許沒有絕對的區別，因為近東的印歐人也許曾經在裡海與黑海以北的草原上生存。

問題的焦點集中在所謂「吐火羅人」及其前身「原吐火羅人」身上。「原吐火羅人」即遷徙到中亞腹地之前說吐火羅語的印歐人。作為古印歐人的一支，「原吐火羅人」最早出現在蘇美爾楔形文字中，被稱為古提人。古提人是赫梯人的近親，後者曾在安納托利亞（今土耳其境內）建立強大的赫梯王國。這裡曾是人類最早的冶金中心之一，其代表性

文明成果是高超的青銅器和鐵器工藝。早在公元前 21 世紀，古提人就活躍在近東，也許他們曾經從南俄草原攻入古巴比倫，也許他們本來就是近東的原住民——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曾驚異於其語言怪異。離開古巴比倫的吐火羅人經過長途遷徙，來到了亞洲腹地——中國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綠洲地區，甚至遊牧於敦煌、祁連山（此祁連山當即天山）之間。中國史書稱其為大月氏人。

公元前 18 世紀以及隨後幾個世紀中，大約對應在中國的夏商時期，印歐人的民族大遷徙所導致的擴張，使東西方文明之間產生了交流與互動。導致民族大遷徙的原因也許與氣候變化有關，夏商時期地球經歷了一次小冰期，使得北方遊牧民族的草場經濟形勢惡劣，過去本以農耕為主的長城地帶的戎狄部落（戎狄非胡）也紛紛南下，也許與南方農耕民族內部腐朽為北方民族帶來了可乘之機有關，也許兼而有之。

本土文明的生長，加上包括印歐人在內的民族大遷徙帶來的外來刺激，促進了歐亞大陸古代文明的發展與變奏，其結果比較複雜：有的因之而泯滅，有的因之而異化，有的因之而提升。最早的東西方文明互動就部分發軔於印歐人，特別是吐火羅人的民族大遷徙。

印歐人拖家帶口，坐着當時最先進的戰車，兵分數路，一支侵入南歐的希臘，一支侵入兩河流域，一支向東南地區侵入印度，還有一支經中亞地區遷徙到中國北方。這樣的遷徙並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在長達千年的時間內分批完成的。到公元前 500 年，從印度河流域到不列顛群島，整個歐亞大陸都被帶入青銅與鐵器時代。

其中，向希臘方向遷徙的古印歐人覆滅了米諾斯文明的繼承者邁錫尼文明，使希臘在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前 800 年進入了「黑暗時期」，直到荷馬史詩時代，希臘轉為奴隸制城邦國家。兩河流域保持着文明的延續，因為進入這個地區的蠻人是「半文明人」，他們推倒了先

前的政權，但是繼承了其文明與制度。公元前 1500 年陸續進入南亞的印歐人自稱雅利安人，印度本土的哈拉巴文化步入衰亡，新入者帶來了吠陀文化，最早的文本為《梨俱吠陀》。他們將原住民貶斥為低等種姓，創造了新的印度文明。

中國的情況則與此不同。中國境內誕生過數以萬計的區域性新石器文化，經過夏商周三代，統一為以黃河中下游地區為核心的華夏文化共同體。商代建立之前，先民的遷移就非常頻繁，而商代在政權鞏固和領土擴張的過程中，經常同西北方向的戎狄部落發生戰爭，促使他們繼續向北遷徙。學者們從出土文物和墓葬遺骸中發現，敦煌以東至河西走廊主要是羌人活躍之地，敦煌以西到塔里木盆地是月氏人遊牧地，阿爾泰山地域則是塞人遊牧地。因此，中國北部邊境的諸多古代民族長期在草原和綠洲一帶活動，共同構成了草原之路和綠洲之路文明交流的媒介。

殷墟卜辭中經常提到「鬼方」「羌方」，表明商朝在高宗武丁時期，曾與西北遊牧民族羌方、鬼方持續進行戰爭。《周易·既濟》卦九三有爻辭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後漢書·西羌傳》作「征西戎、鬼方」。）《周易·未濟》卦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大約在公元前 13 世紀，商高宗武丁發動大規模討伐鬼方的戰爭，歷時三年，始獲成功。武丁的妻子婦好也曾率領超過一萬人的武裝擊敗羌方。商朝的西部邊境於是得以安寧。

羌方大約在陝西、甘肅以西地區，鬼方則在西北部草原，有可能是西進中的印歐人。羌方既然活躍在陝西、甘肅以西地區，與月氏人為鄰，在文化上就受到影響。有證據表明，中文的「蜜」字，其發音就來自印歐語；天山也叫作祁連山，唐代譯作祁羅漫山、折羅漫山、初羅漫山，而天山的譯音可能來自瑣羅亞斯德教（中國史書稱之為「祆

教」)，或者吐火羅語「神聖」一詞。

考古發現也證明了草原之路上的中西文化往來，比如歐亞草原東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前 2200—前 1800 年）出土的青銅釜斧和倒鉤銅矛也曾在中國出現。該文化崛起於阿爾泰山，隨即在歐亞草原擴散，特別是在南西伯利亞地區廣泛傳播，西經烏拉爾山，直迄烏克蘭草原，並大舉侵入中國西北邊陲乃至黃河中下游的華夏文明核心區域。中國境內發現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青銅器有倒鉤青銅刀、弧背刀、空釜斧等，分佈在青海、陝西、山西、河南等地，其中倒鉤銅矛有十件之多。它們被考古學家分為 A、B、C 三個類型，大體說來，A 型 I 式相當於陶寺文化時期（前 2200—前 2000 年），是從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傳入的舶來品。對照一下同一時期中國境內甘青地區和中原內地兩處青銅器類型，可以明顯發現，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 A 型青銅器的水準要高出很多。至於 B 型 II 式青銅器則相當於夏文化時期（前 1900—前 1800 年），C 型相當於殷墟時期（前 1300—前 1100 年）。這兩類青銅倒鉤矛形制上明顯受到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影響，但是卻是在中原地區製造的。換句話說，夏文化時期以及殷墟時期，中國青銅文化已經足以消化吸收外來青銅工藝水平。

總之，商朝與包括塞人、吐火羅人在內的使用戰車作戰的印歐民族有過接觸，也有過衝突。但是，與南歐的希臘、南亞的印度和西亞地區的遭遇不同，商朝擊敗了印歐人的入侵，同時吸取了他們的文化與文明。1972 年，甘肅靈台白草坡發掘了一座西周墓，出土三百多件青銅器，有虎形鉞、象首銅器、鏤空帶鞘短劍，特別是其中一件青銅兵器，發掘報告稱之為「人頭形銜青銅戟」。戟上的人頭像長顙、深目、高鼻、窄面、薄唇，頭戴護耳尖帽，有研究者推測是鬼方首領的頭像。

《詩經·商頌·長發》有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朝

始祖契的孫子，據說他曾經馴服野馬為戰馬。安陽殷墟出土的馬車的形制以及青銅器的風格，與西亞卡拉蘇克文化十分相似。相土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 2000 年，比武丁又要早近 700 年。武丁時期的戰車、戰馬技術已經非常成熟，而相土可能是商部族最早馴服和引進馬的人。

三、華夏邊地與文明的邊疆

夏商周時期中原王朝控制的地區還很有限。新疆地區、四川平原等屬於華夏文化的邊地。

新疆地區的地貌特徵有三山兩盆地之說：三山是北邊的阿爾泰山、中間的天山、南邊的崑崙山，兩盆地是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準噶爾盆地、天山與崑崙山之間的塔里木盆地。吐火羅人遷徙到塔里木盆地，組成了許多城邦，《後漢書·西域傳》所謂西域三十六國是也。現代學者認為吐火羅語有焉耆語、龜茲語、佉盧語（發現於尼雅，即古樓蘭），甚至月氏語也是方言的一種。

從考古學的調查來看，約在公元前第 3 千紀後半葉，新疆北部最早的史前遺存便與南西伯利亞的原始文化相關，來自南西伯利亞的部分高加索人族群，即吐火羅人，進入塔里木河流域。公元前第 2 千紀前半葉，在阿勒泰、伊犁河谷、烏魯木齊、焉耆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塔什庫爾幹等地，廣泛發現了安德羅諾沃文化的遺址，其分佈範圍遍及新疆的中西部地區，並在新疆中部一帶與東來的文化因素發生交互。到公元前 12、13 世紀，南西伯利亞的卡拉蘇克文化興起，持續對新疆地區施加文化影響。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公元前 8—前 7 世紀的塔加爾文化階段。隨着新疆境內本土文化的成長壯大，來自北部的文化影響漸次式微。

與甘肅地區主要是羌人的活動地盤不同，新疆地區的古墓葬中不乏印歐人的遺骸。1979年，新疆樓蘭遺址附近的古墓溝墓地的42座墓葬中，人頭骨具有北歐人體質特徵，推測其年代距今3400年左右，大約在商周時期。樓蘭位於塔里木盆地，這裡是崑崙玉的出產地。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出土了數以千計的文物，其中750餘件玉雕都是產自新疆的和田玉。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四川平原。三星堆的兩個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其中青銅雕像和金屬權杖便是文明交流的見證。一方面，一號坑出土的以青銅人像為主的器物群表現的是祖先崇拜；另一方面，二號坑出土的以太陽形器、神樹、眼形器、鳥等為主的器物群表現的則是太陽崇拜。這是王權和神權並存的反映。這一信仰特點也明顯出現在稍後的金沙遺址中，且有異於商周文明。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合金術，無論其選料、配比、熔煉技術還是合金類別及其用途，都自成體系，與商文化有一定區別。

此外，三星堆代表性文物之一的金屬權杖，其杖首是青銅龍頭；二號坑所出的大型青銅立人，其衣飾的主體部分是龍紋。這些跡象又顯示出三星堆文化與華夏文化的淵源。龍在中原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多有出現，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龍形玉器，但權杖本身卻不是中原文物的特徵。在中國西北甚至遼西的赤峰也曾發現權杖之類的文物，研究者一般認為它們受到西方的影響。三星堆的權杖不排除受西亞、埃及文化的影響。

總之，正如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所指出的，人類是同源的，有着相同的智力原理，因此人類在各地創造的物質文明既具有根本上、宏觀上的相似性，又在工藝、性質、用料等方面表現出區域性和差異性。這種文化交流的特徵，在後來的歷史長河中表現得

更為鮮明。三千年中西文化關係史，本質上是各種文明要素接觸、碰撞、組合與變奏的歷史。

走筆至此，令人突然遐想。如果從浩渺的蒼穹俯瞰，地球真的就是「小小寰球」。從這小小寰球上進化出人類這一生物，人類改造大自然，創造了自己的文明。文明從童年時代發展到今天只不過用了數千年，可是人類的孕誕卻需要生物世界花費數百萬年。人類今天依然處於童年或少年時代。歷史告訴未來，人類自設藩籬的文明邊疆必將逐步開放，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在文明的交流互鑑中迎來更燦爛的青春時代。

第二章

遠古神話中的東方與西方

在先秦時期，中原與西方世界之間肯定已經存在某種物質和文化上的聯繫，斯基泰人活躍於北方草原之路的事實是此種聯繫得以產生的基礎。在一些先秦文獻中就有關於西方世界的描述，儘管現在看起來不乏荒誕與離奇，但卻反映了先秦居民對西方世界的最初認識。在這些荒誕與離奇背後，必然是當時東西方之間業已存在某種聯繫的事實。

一、商周神話中的西方世界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孕育發祥之地，遠古的先民對日落之地——西方總是充滿了遐想。在上古神話傳說中，西方世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烈焰蒸騰的火焰山，有羽毛都浮不起來的弱水，有盛產玉石的崑崙山，還有多情好客的西王母等。畢竟，人類總是習慣賦予未知的世界以各種離奇神秘色彩，這表達了遠古先民對西方世界的渴望與嚮往，也正是這些渴望與嚮往，鼓舞他們不斷對日落之地進行探索。

關於華夏一族對「西方」的認識，要數上古神話中夸父逐日、西王母、崑崙山的故事最為典型。公元前 6 世紀末成書的《山海經》記載了夸父逐日的故事，大家對此耳熟能詳。《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記：「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

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大荒北經》中也有類似的故事。在神話外表背後，有人以為這很可能反映了遠古部族溯黃河、渭河而上，向西北遷徙的經歷。有人更確切地認定其為對嬴秦部族西遷的反映，最遠所到之地在今甘肅中部積石山。還有人認為應從象徵角度理解夸父逐日的故事，即它反映了黃河流域的華夏族先民因為對西方世界充滿好奇與嚮往，極力想要了解它並不惜為此與自然鬥爭。^①

周穆王西巡相會西王母的故事流傳更廣，成書於春秋時代的《國語》《左傳》，以及成書於西漢的《史記》對此都有描述。西晉太康二年（281 年），因盜發戰國魏襄王墓而出土的《穆天子傳》，對此記述最為詳細。^② 周穆王是西周立國後的第五位天子，據傳活了 105 歲。據《穆天子傳》的記載及註本的詮釋，周穆王於即位的第十三年（前 989 年）帶領大批隨從，攜財寶、絲織品、手工藝品，從鎬京出發，西行巡遊，觀崑崙丘、春山於青海湖頭，巡骨仟、重黎、巨蒐等部落於武威地區，會西王母於張掖南山，休獵於疏勒河、北山地區，涉流沙於居延海、巴丹吉林大漠，進而驅馳於陰山、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蔥嶺（地域範圍包括今帕米爾高原、西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和興都庫什山）、中亞，共計行程 19 萬里（此為周里，比今里小）。周穆王來到傳說中的日落之地弇山，此地屬西王母管轄。西王母豹尾虎齒、威力無比，善於呼嘯，然

① 也有更具實證主義精神的人，以為夸父飲河的故事是傳說中虹霓飲水寓言的擬人化。參見：丁山，《古代神話與民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第 225—227 頁。

② 有學者對於《穆天子傳》及其所記載周穆王遠遊行程的可靠性提出質疑。清人姚際恆經過考證，認為《穆天子傳》源出《左傳》《史記》，多用《山海經》語，體例頗似後世起居注，應當是漢朝以後好事者的偽作。有一些疑古派學者則斷定其為晉人偽作。法國學者沙畹甚至以為穆天子並非指周穆王，而是指秦穆公，故《穆天子傳》與《山海經》一樣荒誕不經，毫無史料價值。我們在這裡也只是把該文獻作為反映遠古中西之間聲聞相通的一個傳說來理解，並不作為實證資料來看待。

而其所轄之地卻是幸福樂土。並且，這位長相猙獰的西王母對周穆王極盡客誼，與周穆王把盞酬唱，最後灑淚而別。據說穆王還在弇山之頂寫下「西王母之山」五個大字，命人刻石立碑。

以上故事發生的時間不能確考，但肯定歷史較為久遠。《穆天子傳》中優美而飽含浪漫色彩的故事可能曲折地反映出一些歷史事實。清代四庫館臣們提出，西王母是西方一國君。後人進一步研究認為，西王母是西方獏族人的圖騰神。西，表示方位；王，有神的意思；母，即獏的音轉。西王母即西方的神獏。《穆天子傳》所謂「西膜」，即這一族人，穆王所見的西王母，就是當時西膜的君長。有人甚至將《穆天子傳》與西方典籍相引證，言之鑿鑿地認為西王母乃阿拉伯南部古代示巴國的女王，因為《聖經·舊約·列王記》裡有示巴女王見以色列王所羅門的故事，其時代正約略與周穆王時代相當。但此說法立刻遭到反駁，因為據《史記·大宛列傳》，西王母活動於條支一帶，跡近地中海岸。據《漢書·地理志》，則西王母石室位於祁連山南麓，西王母不可能指遠在阿拉伯半島的示巴女王。另有人提出，西王母可能是東周時期從中原周邊地區傳入的神靈。儘管對於西王母的身份眾說紛紜，對於《穆天子傳》所述事件的真實性也頗多疑問，但這個故事卻說明黃河流域的華夏族對中亞及西亞地區已經有了一些歷史地理知識，也反映出黃河流域與蔥嶺以西地區早在公元前 10 世紀就已經有了比較牢固的聯繫。據說周穆王西巡時帶去了大量絲綢、銅器、貝幣，贈予所到之處的酋長，各地酋長也以馬、牛、羊、酒和玉石之類回贈，這可能反映出當時中西之間的一種貿易方式。

崑崙山是中國上古神話中又一個典型的西方世界。最早的記載見《尚書·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意思為崑崙、析支、渠、搜四國，其民皆穿皮，總稱西戎。《山海經·海內西經》稱：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下之都。」《莊子》中稱黃帝曾登崑崙，《穆天子傳》和《列子》則記載了穆天子登崑崙之巔，以觀黃帝之宮殿。此後《史記·大宛列傳》試圖把「崑崙山」這個意象具體化：「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山。」根據上述記載，有學者認為崑崙山就在現在的青海，因為「青海」在蒙古語中為「Koko Nor」，極有可能就是漢語「崑崙」的音轉。有學者則認為「崑崙」與嬴秦部族西遷的歷史相關，所以它不能遠過陝甘之間的隴山，這一帶是西部諸戎活動的主要區域。我們還可以從古代的文獻記載中看到「崑崙」有多種含義，時而是民族之稱，時而是地名，而漢唐時期還常把販賣至中國的非洲黑奴和東南亞黑奴也稱為「崑崙奴」，越南的一個外島漢名就是「崑崙山」。《史記·大宛列傳》對崑崙山的定位則完全是為了附和古時傳說，不足以為實證。

無論是否能夠從地理上找出一個與「崑崙」相對應的地方，我們都應該承認，崑崙山神話的意義首先在於它與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斯山、印度神話中的須彌山（又譯作蘇迷盧）一樣，代表眾神所居之地。大約同一時期在歐洲、南亞、東亞出現了內涵相似的傳說，或許體現了東西方文化在某些原初觀念上的相似性，甚至可能暗示了遠古時期文化交流的可能性。^①在漢代緯書中，西北極遠之地的崑崙山意味着大地之軸心，並與西王母的居處緊密結合，又與西方求仙思想相結合，愈發充滿神奇魅力。

① 有學者甚至認為，這三個傳說有極大的同源性，而其原型來自今土耳其東部的阿勒山，此地被認為是《聖經》中洪水過後諾亞方舟的停留之地。還有人引《說文》云：崑為古渾切，崙為盧昆切。大約是音譯「Kuhura」其後一字而成（且此實為阿勒山，波斯人呼之為「Kuh-i-nuh」，則音與崑崙更近）。

二、上古文獻中的西方國家

夸父、西王母、崑崙山的傳說更多反映了黃河流域華夏先民對西方未知世界的嚮往與渴望，其內涵引起多方猜測。然而古代文獻中對西周之國、軒轅之國、沃民國、懸圃等的記載，卻能在幾乎同一時期的西方文獻中找到頗相一致的內容，這或可視為關於遠古時期中西方之間實際聯繫的雪泥鴻爪。

《山海經》記載的西周之國、軒轅之國的開國傳說與古波斯頗為吻合。《大荒西經》記載，西北海之外有西周國，其國姬姓，食穀，從事農業生產。又據《穆天子傳》，周太王古公亶父曾將嬖臣長季綽封在春山（即蔥嶺）東側，在此建立起周族移民國家。《海外西經》記軒轅國，在窮山（即春山）之際，女子國之北，此地還有一座頗具亞述、巴比倫壇塔風格的方丘，稱作軒轅之丘，女子國則被認為是克什米爾境內的蘇伐剌拏瞿坦羅。

而在古波斯的開國傳說中，早期君主曾活動在廣及中亞阿姆河和新疆天山南麓的吐蘭國境，和當地的吐火羅人通婚。公元 10 世紀的波斯詩人菲爾杜西根據古史創作的史詩《列王記》（又稱《王書》），敘述了季夏曾在中印邊境遊牧，娶了馬秦國王馬王的女兒為妻。「馬王」的意思是「大王」，就是周太王古公亶父。這和《穆天子傳》中古公亶父封長季綽，又「妻以元女」的記載正相吻合。羯盤陀（今塔什庫爾幹）的開國傳說中則記載了中國人與波斯人共同建國，據說波斯國王因娶中國公主自于闐（今新疆和田）歸國，途遇戰爭，將公主留在該地。中國公主因感懷日神而得子，就地立國。羯盤陀君主因其父是日天之神，母是漢土之人，具有神通的本領，能飛行虛空、駕馭風雲，其後裔自稱漢日天神。上述兩方面的故事可能同時反映了華夏文化在商代末已開始進

入蔥嶺地區。

此外，中國古代文獻中還透露出對兩河流域的初步了解。《大荒西經》和《海外西經》描述了一個「沃民國」，處於比西王母山還靠西的壑山、海山以西很遠的地方。其地土地肥沃，盛產甘華、甘柢、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等，多銀鐵。其國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民食鳳鳥卵，飲甘露漿，人們的生活都很美滿幸福，是人類的理想家園。這些記載儘管有些荒誕，但反映了當時中國對兩河流域的最初了解。根據學者的研究，《大荒西經》中的西王母山當屬廣義的崑崙山脈，崑崙山脈以西的壑山，當是興都庫什山脈的另一譯名，庫什 Kush 是波斯語中的山 Koh，譯為壑山。翻越興都庫什山脈即進入伊朗高原，在錫斯坦的哈蒙湖上有科·伊·胡瓦賈神山，因伊朗傳說中光明山落入海中而升起胡瓦賈神，故此地有海山之說。再往西就進入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這樣看來，沃民國的大體位置只能是美索不達米亞。在古代，這裡農牧俱興，百貨薈萃，是少有的沃野。沃民國人人食用鳳鳥卵、甘露漿，這些可與西亞的鴝鳥蛋、甘露樹對應；沃民國還出產香料、水果、肉類、良馬、寶石，這些也都可以美索不達米亞找到對應的特產。沃民國的另一個特徵是「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而鳥形人 and 大鳥的圖像更是遠古時期西亞的常見圖案，曾是亞述的民族標誌，在公元前 8 世紀即已出現，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也非常流行這種有翼天神圖案。

《穆天子傳》中稱：「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 and 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據此，則判斷縣圃位於春山腳下。《離騷》中記載：「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這裡的「不周」，或認為即《山海經》中提到的位於華山西 7 760 里處的不周山，後代學者多認為就是蔥嶺；「西海」則或是今鹹海

或黑海，或今波斯灣、紅海、阿拉伯海，總之在蔥嶺之西；而「懸圃」即懸圃，必定也在這一地區附近。《淮南子》對「懸圃」有更多描述，稱從崑崙山的疏圃再往西，就可以到達一個叫「懸圃」的地方。一到那裡，便可以呼風喚雨，駕馭自然，隨心所欲，從懸圃再往上走便可登天，天上是太帝所居，人到達那裡便能成仙。這些記載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空中花園和傳說中的巴別通天塔。也許那些到過巴比倫城的遠方來客將這座古代世界最偉大城市的輝煌景象傳揚至四方，並輾轉到達中國。^①

三、神秘的希伯波里安人

與黃河流域流傳的「西王母」故事類似，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也有一段關於遠東的希伯波里安人的動人傳說。傳說中的主人公阿里斯特進行了一次傳奇的東方旅行。

根據傳說，阿里斯特居住在巴爾幹半島與小亞細亞之間馬爾馬拉海中的一個美麗小島，曾寫下敘事長詩《阿里瑪斯培》，記述他的一次遠東旅行，其中提到了許多東方民族，還有怪異的動物，獅身鷹首的金庫守衛神等。他筆下的希伯波里安人生活在最東部，那是遙遠的北風吹來之地。他們神聖、純潔而善良。那裡群山環抱，氣候宜人，沒有仇殺，沒有戰爭，人們都長生不老。詩人說，主神宙斯之子洛格里斯就是從希伯波里安人那裡獲得能使人長生不老的金蘋果的。除了神仙和

① 關於懸圃，《山海經》《淮南子》《穆天子傳》都有所記述。大體是說崑崙山（或稱崑崙山附近的槐江山）上有黃帝時代的園林懸圃（又稱玄圃、平圃）。因為地理位置很高，看似懸掛在雲中的花園，故名懸圃。登上懸圃，人就有了靈氣，可以呼風喚雨。主管懸圃的神人英招，人面馬身鳥翼，通體有虎紋。本書並不認為可以完全坐實懸圃即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但此例或許可以說明遠古時代東西方之間曾有可能分享某些共同的歷史傳說。

英雄，凡夫俗子是無法進入這片樂土的。被妒火攻心的天后赫拉驅趕的宙斯的情人伊娥，也只能到希伯波里安人的西鄰阿里瑪斯培那裡去，無法再遠行。儘管阿里斯特的這首敘事長詩早已散佚，僅剩零片斷簡，但他所介紹的故事卻因為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轉述而廣為世人所知。

關於詩人阿里斯特，眾說紛紜，評價不一。但是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阿里斯特生活在公元前 7 世紀後半葉，而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在他之前很可能就已經流傳。公元前 8 世紀以《田功農時》《神譜》等詩作而聞名的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就提到過希伯波里安人，後來，著名敘事詩人平達也將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追溯到公元前 7 世紀之前。

關於希伯波里安人的認知，近兩個世紀以來取得了重大進展。19 世紀晚期就有學者大膽提出，善良溫和的希伯波里安人就是古代的中國人。20 世紀 60 年代，一些英國學者通過系統整理阿里斯特的敘事長詩，進一步證實阿里斯特的東方之旅確有其事，並認為他很有可能是光明之神阿波羅的一名祭司，前往東方旅行的目的就是到幸福的希伯波里安人那裡去進行一次「朝聖之旅」。^① 因為古希臘神話說阿波羅神要到那裡度過冬天，並享受 100 頭驢的隆重祭典，然後再乘坐天鵝御輦回到天堂。史詩記載，阿里斯特在神的召喚下首先來到了俄羅斯，在北風之神的指引下，頂着西伯利亞的寒流，繼續往東行，一直走到東亞腹地。

20 世紀 90 年代，又有德國學者在研究早期中歐關係時，再一次肯定了阿里斯特筆下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是歐洲關於中國的最早認知。^②

① J. D. P. Bolten, *Aristeas of Proconnes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Folker Reichert, *Begegnung mit China*, Sigmaringen, 1992, S. 15-22.

人們在解釋希羅多德記述的公元前 7 世紀又一場民族大遷徙時說，所有的遊牧民族都捲入了那場亞歐民族間的流動，唯獨安靜的希伯波里安人例外，原因就在於他們是安分的農耕民族，與斯基泰人那樣的遊牧民族不同，並考證出與希伯波里安人相鄰的阿里瑪斯培人是蒙古種族，史詩中所提到的伊塞頓人就是中國文獻中出現的烏孫人。總之，從史詩中可以看出，希伯波里安人就在離詩人不遠的地方，但伊塞頓人向他編造的許多恐怖的故事，使他最終無緣進入那片幸福樂園。這很容易讓後人想到，是那些居間牟利的商人不願放棄東西方貿易的壟斷中介地位時才想到的詭計，就如東漢時期甘英出使大秦時在安息（帕提亞帝國）經歷的那樣。

四、秦那的傳說

希伯波里安人的傳說仍然像一個美麗的神話，而此後不久在西方出現的「秦那」或「秦奈」「(Cina)」這一名稱，則被學術界公認為對中國的稱呼。這無疑體現了隨着中西之間交往日益頻繁和了解日漸深入，東方的中國對西方人來講已經不再僅僅是個美麗的神話，而開始有了具體、清晰的內容。

在現代歐洲對中國的稱謂中，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蘭文、英文和德文都寫作 China，法文作 Chine，意大利文作 Cine，皆源於約公元前 1 世紀出現的希臘文詞彙 Thinae 或之後出現的拉丁文譯名 Sinae / Sina，而這個希臘文詞彙還可追溯至更古老的時期。

公元前 550 年，波斯貴族居魯士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大流士統治時期（前 521—前 485 年），波斯帝國的領土西起埃及，東至印度西北和粟特，東北邊疆已和蔥嶺以西的斯基泰遊牧區接壤。大約公元前 5

世紀，波斯古文獻中已載有其東邊的文明國家「中國」的名稱——「支尼」(Čini / Saini)，這同古代波斯文對中國的其他稱呼 Čin、Činistan、Činastan 等源出一體，也都和粟特文中的 Čyn 相近，發音亦近似於「秦那」。

和波斯人一樣，印度人最早也稱中國為「秦那」。現存最早稱中國為秦那的印度載籍是公元前 5 世紀的《摩奴法典》和史詩《摩訶婆羅多》，隨後是公元前 320 年至公元前 315 年成書的《考鐵利亞》，但《摩奴法典》和《摩訶婆羅多》後來遭遇增改，所以可信度反而不如《考鐵利亞》。「秦那」這個名稱可能就是通過波斯或印度傳入希臘的，同時傳入的還有關於這個國家的知識。

「秦那」作為西方對古代中國的最早稱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學術界基本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該詞彙為「秦」的譯音。此說最早由明末入華耶穌會士衛匡國在其 1655 年於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新地圖集》中提出，並得到 20 世紀許多學者的贊同，如伯希和、季羨林、饒宗頤，但是他們作了一點修正，認為此「秦」應指戰國時的秦國，而非一統中國的秦朝。這個觀點的主要根據是，春秋戰國時期位於中國西北方和西南方的某些少數民族極有可能已經知道「秦」這一名稱。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穆公時，「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的名聲有可能從此傳向中亞，並由中亞繼續傳向南亞乃至歐洲。戰國時，匈奴人、月氏人、烏孫人都與秦國相鄰，也都有可能成為「秦」這一國名的傳播媒介。而在中國西南方，據《史記·秦本紀》和《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國將領司馬錯曾於公元前 216 年伐蜀並滅之。至嬴政繼秦王位時，「秦地已併巴、蜀」，而近代的許多考古發現證明，蜀人在春秋戰國時期即與外界（包括南亞）有過物質交流關係，那麼蜀地歸秦之後，稱蜀人為「秦」這個名稱傳至印

度也是自然之事。^①

另一種觀點認為「秦那」是絲織品之名的譯音，與中國當時外輸的絲綢有關，確切來講，就是「絲」之譯音。印度古籍《考鐵利亞》除提到 Cina 這個地方外，還記載 Cina 有絲捲運至印度銷售，其中用來指絲捲的詞是 Cinapattasca 和 Cinabhumijah。這種物品的名稱與其產地之名有直接關係。印度人差不多在認識中國名產的同時認識了這個國家，由此以名產「絲」之名代稱其國。那麼「絲」之音如何轉變為 Cina？有人分析，絲的古音是 Si 或 Ci，傳至中亞時，因當地語言慣於在單數詞尾加 r，在複數詞尾加 n，於是 Si 或 Ci 的單數變為 Sir 與 Cir，複數變為 Sin 與 Cin。可作為輔證的是，古康居文稱中國為 Cynstn，去除表示「地」的後綴 stn，剩下的 Cyn 與 Cin 實為同一詞的異寫。傳至印度後，進一步增加了收聲音符 a，於是絲的複數變成了 Sina 或 Cina。後來這個以「絲」之複數稱中國的詞又從印度傳入希臘。而大約公元前 4 世紀出現在希臘文獻中的另一個對絲國的稱呼 Seres，則是「絲」的單數稱呼從中亞傳入希臘後的演變結果。^②

① 有關論述可參見：饒宗頤，《蜀布與 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載《梵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② 此觀點的代表性論述見：韓振華，《支那名稱起源考釋》，收於陳佳榮、錢江編《韓振華選集》之一《中外關係歷史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9 年，第 1—12 頁。還有人將「Cina」一詞視為「綺」的譯音，理由如下：商周以來製造的絲織品以文綺最為普遍和精緻，所謂織彩為文曰錦，織素為文曰綺，錦出現在公元前 8 世紀，而綺則商代已有。春秋戰國時期的綺更加精益求精，織法新穎，花式繁複，當時輸出境外的極有可能是這種綺，所以中亞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產綺之國——「綺國」。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錦、絹、綢、綾、繡、絲等專名，卻獨無「綺」字，概因「綺」就由國名「Cina」代表。關於此問題的概要描述見：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7—29 頁。此論顯然沒有解釋「Cina」這個詞的來源，以及何以要將產綺之國叫作「Cina」。

五、「賽里斯」的故事

如果說學術界對於「秦那」的原意還有爭議，那麼對於西方另一個有關中國的稱呼「賽里斯」(Seres)，則大家都普遍認同就是指中國絲綢。這個名稱據說最早見於公元前 416 年到公元前 398 年擔任波斯宮廷醫生的希臘人克特西亞斯的《印度記》。書中記載，遠東的賽里斯人和印度人一樣身材高大，壽逾 200 歲。不過這段材料的實際來源是公元前 4 世紀初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時期的將領翁尼雪克里圖。亞歷山大的另一位將領尼阿庫斯，據說在屯駐北印度時見過賽里斯人製作的衣袍。所以，比較可靠地說，歐洲文獻中關於賽里斯的最早記載應該歸於亞歷山大時代。亞歷山大進行的東征是東西交往歷史上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它第一次使歐洲與亞洲腹地發生了密切聯繫，其軍隊前鋒最遠曾到達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及印度河流域。此次東征的成果是建立起一個從地中海沿岸跨至印度北部的大帝國，儘管這個龐大帝國的政治結構隨着亞歷山大去世而迅速分裂，但是在歐亞大陸的這一廣大區域裡產生了歷時長久的「希臘化」運動，疆土從地中海東岸延伸至印度北部的塞琉西王國（中國史書稱之為「條支」），就是這場「希臘化」運動的醒目見證。大批希臘人移居埃及、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帶去了希臘的經濟和文化，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國新疆地區都發現了希臘文化的遺跡。亞歷山大東征的成果無疑也應包含讓西方人進一步了解東方、了解中國這一層意義，「賽里斯」這個名稱就是一種體現。

提到賽里斯國或賽里斯人的，還有斯特拉波寫於公元前後的《地理學》和《古典名著選》，公元 1 世紀末馬利努斯的《地理學知識》和梅拉的《地方志》，以及老普林尼寫於公元 77 年的《自然史》（又譯《博物

志》)。公元 2 世紀的古羅馬傑出地理學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學》中對賽里斯的描述可稱為古典時期對這一地區認識的總結，除了對賽里斯人的一般性介紹外，他還詳細描述了賽里斯國的位置和範圍，甚至推算出從位於帕米爾高原塔什庫爾幹的石塔地區到賽里斯的都城塞拉的距離為 18 100 希臘里。托勒密的這些記載儘管仍有許多錯誤，但表現出中國在西方人的觀念中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托勒密的記載還長期作為歐洲人認識中國的基本依據，16 至 18 世紀仍有歐洲人據此來判斷傳教士對中國的描述是否屬實。公元 2 世紀的希臘地理學家帕薩尼亞斯提到希臘人用 Seres 作為國名，而其國出產的提供紡織原料的小蟲被稱為 Ser，他說當地人對這種小蟲的稱呼不是 Ser，而是完全不同的稱呼。

Seres 和 Ser 顯然是外人對中國某種物產的稱呼，現在人們多同意二者是與絲有關的名詞的音譯。有些學者認為希臘詞 Seres 和拉丁詞 Sericum 的語源當為 Sir。Sir 的來歷，或如上文提到的觀點，是「絲」之音在中亞地方被加上單數後綴的結果。英國語言學家亨寧提供了一個可支持此說的證據，即「賽里斯」在粟特文中被寫作 Sry，也是指絲綢。學者們更舉了諸多例子表明中國以西諸地對「絲」的稱呼有相似的詞源，如在阿爾泰語中，蒙古語稱為 Sirghek，滿語稱為 Sirghe，朝鮮語稱為 Sir，可見「絲」之轉為 Sir 與阿爾泰語有淵源。又，波斯語稱「絲」為 Saragh Sarah，亞美尼亞語稱 Seram，希臘語稱 Ser，希臘語對「絲」的稱呼經過中亞、西亞、小亞細亞轉化而來。^① 還有人認為，Sir 是「繒」、「絹」或「蠶」的對音。

上述稱呼無論如何都與絲綢有密切關係。從歷史情境來考察，這

① 白鳥庫吉《西域史的新研究》一文於此論述最詳，收於《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王古魯譯，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 年。

些絲綢產自亞歷山大所征服之領土的東面，希臘人因此把這個出產絲綢的國度稱為「賽里斯」，意即「絲國」，這並不違背古人對一個地方的命名習慣，即以其特產為其地之名。公元前 130 年至前 87 年，阿帕洛杜勒斯曾記述，巴克特里亞（即大夏，前 245 年從塞琉西王國中分裂出來的希臘化國家）的領土在公元前 201 年已擴展到和賽里斯接壤之處，這些賽里斯人據說是碧眼紅髮。這裡所說的賽里斯人應該是講東伊朗語的斯基泰人或月氏人，他們是除印度人之外另一個向希臘人傳遞中國知識的渠道。

從 Cina 和 Seres 的流傳來看，無論是從印度傳到希臘，還是經中亞傳到希臘，中國和絲綢總是被西方作為合二為一的概念，可見在漢武帝有意識地發展政府間往來之前，中國與中亞及南亞的民間貿易和文化交流早就有一定規模，中國最古老的神奇特產——絲織品，成為西方人對中國最華麗的印象。弔詭的是，源出「絲」字的 Cina 之稱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演化為 China 之後，又於指稱國家之外被用來稱呼當時歐洲人為之傾倒的另一種舉世無雙的中國特產——瓷器。雖然如今學術界傾向於用 Stoneware 來稱呼中國人發明的硬質瓷器，但 China 作為這種物品的流行俗稱始終提醒我們，歐洲人曾經為中國的瓷器癡狂。類似的是，古代中國人以寓意「玉之地」的詞語「于闐」或「禺氏」稱呼崑崙山附近那個美玉的出產地，阿拉伯語以 Kabulah 一詞命名東南亞出產白豆蔻的一個地方，於是它得名哥谷羅國。此外還有香料群島、胡椒海岸，諸如此類。將特產之名和出產地之名混用看來是人們的一種常見做法，也強有力地表達了人們對一種遠方物品甚至對異域的嚮往之情與想像之心。

第三章

希臘化時期：絲路之前的中西文明交流

在全球史開拓者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構建的全球譜系中，公元前 500 年之後，即中國進入戰國時期之後，世界進入歐亞平衡的時代。這個時代切分始點與雅斯貝爾斯構建的「軸心時代」相契合。後者認為，以這個時間為主軸，古希臘的先哲、猶太人的先知、印度的佛陀以及中國以老子、孔子為代表的先賢，都出現在這一時代。繼農業革命、金屬工具（青銅和鐵器）廣泛使用之後，人類各大文明都實現了精神上的超越。換句話說，世界各大文明的文化個性更加鮮明。在歷史上，這一段時期也被稱為「帝國時代」，從西到東分別是繼承了希臘文明遺產的羅馬帝國、繼承了波斯帝國遺產和亞歷山大帝國遺產的帕提亞帝國、貴霜帝國、匈奴帝國、秦漢帝國。公元 1 世紀全球人口約有 2.5 億，其中羅馬帝國統治 5 000 萬，漢帝國官方統計人口為 6 000 萬。^①

在亞歐大陸四個高度文明的地區中，中東文明版圖最廣，位於古老的、已部分受到侵蝕的中東高原。從波斯帝國之後多少有些衰落的世界主義中可以識別出中東遠古文化的遺產。與中東文明相鄰的兩個文明較為年輕，也較為凌亂：一個以愛琴海為中心，它的枝丫一直伸展到

① 拉烏爾·麥克勞克林，《羅馬帝國與絲綢之路》，周雲蘭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一章第 1 頁。

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個分佈於印度北部的印度河和恆河流域。麥克尼爾有一句話概括中國：「中國文明幾乎是孤立地屹立在遙遠的東方，正在向它成熟後的獨特形式發展。」這種均勢始終是搖擺不定的，尤其是在中東。亞歐文明中的三個（希臘、中東、印度）在這裡交匯，其北面草原是游牧民族的發源地。遼闊的中國處於世界性的交匯地區之外。

連接亞歐主要文明的另外兩條路線是：（1）穿過中亞綠洲的商路。自公元前2世紀起，由於幾個帝國的組織、保護和設立稅卡，形成從中國到黎凡特的「絲綢之路」，從此，商旅絡繹不絕。（2）穿越開闊的亞歐草原的商路，稍晚出現但依然十分古老。在這條商路上，草原游牧部落時而與南方開化的近鄰通商，時而搶劫它們。

沿着這些商路的貿易變動無常，作為貿易副產品的文化交流，其意義也因此變動無常。一般說來，除因軍事行動而造成各個文明交接地帶邊界的變動之外，亞歐文明相互的借鑑是有選擇的、自發的，相對而言作用並不明顯。只要任何一個主要文明處於與其他文明大致相同的水平，人們就很難看到為接受外來新奇事物而放棄祖先傳統的理由。只有當外來征服和內部衰落嚴重威脅到既有制度時，文明的傳人才會顯示出對異己文明的深刻理解。

一、希臘化時期之前新疆地區的文化交流

中國與西部世界的交往，最早自然是從新疆開始的，但是，對於中原華夏政權統治下的史家、作家和文獻編者來說，新疆就是他們所稱的「西部」，《史記》及《漢書》中的「西域」的主體部分就是新疆。而新疆地區所見的中西交往，則必須向當今的考古學家求教。

考古學家告訴我們，最早進入新疆腹地的歐洲人群體，以孔雀河

古墓溝墓地遺存為代表的原始歐洲人類型為主。由於這一墓地遺存中尚未見到東來文化因素，所以我們還不能肯定在距今 3 800 年前的羅布泊地區是否已經開始了東西文化的首次接觸。

在東疆地區，東來文化因素最早進入該地區的時間是在距今 3 300 年前後形成的焉不拉克類遺存時期，或是稍早一些的雅滿蘇礦林場辦事處墓地（簡稱雅林辦墓地）遺存早期階段。與此同時，北來的歐洲人群體及其文化因素也進入了這一地區。在北疆北部地區，從距今 4 000 年的阿凡納謝沃文化到安德羅諾沃文化早期階段，北來的歐洲人群體就已分佈在這一帶，由此繼續東進，來到了東疆東部地區。在伊犁河谷地區，這種文化接觸過程發生的時間相對較晚。

在南疆西南部地區，從距今約 3 000 年開始，繼續向西發展的蒙古人種群體及其東來文化因素，沿天山南坡地帶推進到焉耆盆地，在此與東進的地中海東支類型人種群體發生接觸和融合，形成了混合型文化——察吾乎溝口墓地遺存類文化。

在稍後一段時間裡，東來的蒙古人、北來的原始印歐人、西來的中亞兩河類型人和地中海東支類型人的不同群體，在天山中部地區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接觸，形成了包含四種文化成分的混合類型文化——魚兒溝墓地遺存類文化，從而完成了中西文化最初階段的文化交融過程。這一過程的完成比絲綢之路的開闢早 300~400 年，而這一文化接觸、交流、融合的全過程大約進行了 1 000 年時間。正是這些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長期發展，使其後更大範圍的中西文化交流，即絲綢之路的開闢，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①

① 水濤，《新疆青銅時代諸文化的比較研究——附論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羅豐主編《絲綢之路考古》第 1 輯，第 45—75 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 年。

東西方文化在新疆的傳播路線，體現了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大多數傳播路線是沿着易於通過的自然地理通道向前推進的，具體地講，從東向西傳播的文化因素有兩條主要的路線：一是沿河西走廊北山的山前地帶，西進到哈密巴里坤地區，如馬廠類型遺存和四壩文化；另一條是沿祁連山南坡的山前地帶經一些山口進入哈密南部和羅布泊北部，這應是卡約文化向西發展的路線。這兩條路線在東疆交會後繼續西進，經吐魯番盆地和阿拉溝越過天山進入南疆。

新疆地區的塞人文化無疑會傳達到河西文化，與這裡的西戎文化對接。

1972年，甘肅靈台白草坡發掘了一座西周墓，裡面的「人頭形盞青銅戟」屬於白種人。類似的頭像還見於1980年在陝西扶風一處西周宮殿遺址出土的兩件蚌雕，表現出白種人的體質特徵：長顱、高鼻、深目、窄臉、薄唇。這兩個頭像也戴着尖頂帽子，但尖頂被鋸掉。帽頂鋸出的平面上刻着田字符號。他們很可能屬於同為白種人的吐火羅人。在樓蘭、焉耆和龜茲（今新疆庫車）等吐火羅各支系中他們更可能屬於月氏人的形象。因為月氏人實際控制着塔里木盆地至鄂爾多斯草原的廣大地區。在河西走廊，他們很可能與戎狄、羌人部落發生衝突。

在此不能不提具有亞歐草原風格的甘肅天水市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墓地出土的文物。馬家塬類型被定義為東周西戎文化的一種類型。馬家塬類型的年代被推定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除甘肅漳縣墩坪墓地的年代可早至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外，其餘墓地的年代集中於戰國中晚期。

馬家塬戰國晚期墓地出土的一種釉陶杯，從杯子的風格看，有西戎文化特徵，有學者認為來自中亞。馬家塬類型的隨葬品以北方系青銅器為主，主要器物為車馬器、車馬飾件及人體裝飾，陶器數量極少，

部分墓葬有車作為隨葬品。各遺址出土的隨葬品在數量、器類、製作水平上存在差異，如陳陽川墓地出土器物數量少、種類單一，並不似馬家塬墓地出土的隨葬品精美奢華，這種差異應是等級差別造成的。

考古工作者在陳陽川墓地採集到一件獅噬羊的銅牌飾，與馬家塬墓地出土銅帶飾極其相似，這種獅子吞噬羊的裝飾題材，在北方草原地帶的牌飾中十分常見。但是，馬家塬和陳陽川的銅牌飾不同之處在於，獅子的鬃毛和尾巴是否在背部彎曲成相背的鳥首。有學者認為這種背上有鳥首的圖案可能來源於斯基泰和巴澤雷克文化，^①從中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東向的影響力。

甘肅張家川馬家塬墓地 M1 號墓出土過一個銀杯套，也屬於戰國晚期西戎文化。這個銀杯套用大約 0.05 厘米的薄銀片捲成，高 8.4 厘米，口徑 6.6 厘米，杯的手柄兩側各嵌有一段長銅條，用於把捲起的銀杯鉚接起來。杯套內可能有竹木製作的內膽。這種杯具無論是材質還是用途，都反映出歐亞草原風格。

學者對馬家塬戎人造車的細節及其整車結構作過細緻的分析。首先是根據型制分出不同類型。馬家塬墓地所出土的古車形式各異，但是也可以看出，其整車設計思路和製作工藝細節都有一定的規律性。

二、希臘化時期西域的文化交流

公元前 4 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滅亡了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① 參見：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文物》2009 年第 10 期；張寅，《東周西戎文化馬家塬類型來源初探》，《考古與文物》2019 年第 2 期。

佔領巴克特里亞之後，南下印度，未曾及於新疆。公元前 323 年亞歷山大大帝由於過度酗酒，死於波斯王宮，帝國隨即陷於分裂，但是，希臘文化和制度卻影響了所征服地區，西亞與南亞、中亞被帶入希臘化時代，在新疆的西部出現了一個希臘化文化圈。

比如，亞歷山大率軍入侵印度，留下部分軍隊在阿富汗阿伊·哈努姆築城而居。其遺址於 20 世紀 60 年代被法國考古學家挖掘，是希臘最北部的城市建築遺址。這裡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其中有一尊銅像，高 18 厘米，寬 9 厘米，厚 3 厘米，是希臘神話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同一地方還發現了科林斯柱頭、赫爾墨斯柱希臘風格的建築殘存。年代在公元前 3 世紀到公元前 2 世紀，相當於戰國末到西漢前期。^①

希臘化文化圈的文明是互動的。東方的宗教也傳播到西方，大大促進了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歐洲的轉變。希臘的藝術、宗教也影響到了東方，希臘化文明是一種混合物，而不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植物。換一句話說，不要以為希臘化僅僅是希臘文化單方面對於其他文明的「入侵」，相反，希臘文化元素就像一個觸媒，它的摻入引發、激活了所在地區文明的變奏。希臘化的結果是「第三者」。

從地緣政治上說，橫跨歐亞非的亞歷山大帝國分裂之後，其中波斯及其以東地區為部將塞琉古控制，公元前 304 年，塞琉古稱王，建立塞琉西王國，傳至安條克二世（前 261—前 246 年在位）發生內亂，斯基泰人的分支帕爾尼人擁立阿爾薩西斯在帕提亞稱王，脫離塞琉西王國獨立，建立了統治 470 餘年的帕提亞帝國（前 247—224 年），中國史書稱之為「安息」，其存在時間與秦始皇統治時期至兩漢時期大體相當。

① 敦煌研究院編，《絲路秘寶：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珍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 年，第 12—15 頁。